

朱熹的待人哲学与林彪

院 大 批 判 组

(一)

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凡属开倒车、搞复辟、反人民的家伙，都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而自南宋以后，这种人又没有不推崇朱熹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继承孔孟衣钵，把孔孟搞复辟的一套反动货色，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既顶礼孔丘，又膜拜朱熹。他在黑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不言朱熹而称朱子，一副五体投地的奴才相，真是令人作呕！

尊孔与崇朱二者之间是有必然的逻辑联系的。朱熹晚于孔丘一千六百多年，他集中了历代儒家对孔孟之道的阐释与加工的全部毒素，从而建立了唯心主义的理学系统。他是孔家店中一员最卖命的吹鼓手，最狡猾的大掌柜。

朱熹生长在南宋中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他效法孔老二，聚徒讲学，炮制了大量宣扬孔孟之道的毒草，鼓吹“性命义理”之学。他编注的《四书》成为封建社会的钦定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准据。他是理学奠基人程颢与程颐的四传弟子。在政治上二程属于旧党，反对王安石变法。朱熹曾经编过一部《三朝名臣言行录》，恶毒地咒骂具有法家思想的王安石，可见他是尊儒反法的顽固派。他在地方官任内，曾经拿起血淋淋的屠刀，疯狂地镇压过农民。对于金人的侵略，朱熹在年轻时曾一度标榜抗战，但很快就走向妥协，发出了

党躲在阴暗角落里，一次再次地书写反革命条幅，叫嚷要“克己复礼”，把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他们抹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篡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实质，诬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攻击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妄图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拚凑反革命别动队，积极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其狼子野心何其狠毒！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林彪一伙被碰得粉身碎骨，落得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耻下场。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林彪所推行的“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了帝、修、反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当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正是一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彻底革命精神，充分认识反复辟的重要性，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更自觉地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何恢复之可图乎”①的疑问，当时就有人批评他“安于君父之仇”，“低头拱手以谈性命”②，实际上是一个投降主义者。

朱熹生前，理学曾遭到禁黜，但由于他的一套主张，有利于反动派，有利于剥削阶级，有利于开历史倒车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所以《宋史·道学传》说：“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林彪正是妄图建立父子相袭的王朝，以“时君世主”自命，“欲复”资本主义“之道”，而虔诚地向朱熹取法求教的。

朱熹生前官虽做得不大，但在他死后，终于受到了南宋理宗的特殊优待，追封为太师、信国公、徽国公③。还被请进文庙从祀孔子，陪着一同吃冷猪肉④。到了明代嘉靖年间，“祀称先儒朱子”⑤。爱新觉罗入关后，朱熹在文庙内的地位再有提高，列为“十哲之次”。其后，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和独夫民贼蒋介石都吹捧过朱熹。尊孔与崇朱已成为一脉相承、两位一体的事情了。

(二)

林彪所推崇的朱熹的待人之道，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朱熹的待人之道也就是儒家的待人之道。自从汉代的《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义》这两部书先后明确提出了“三纲”和“五常”的名目之后，“三纲五常”便成为儒家提倡的待人之道的根本准则。不过朱熹在这方面有他粉饰补缺的一番“功绩”。作为唯心主义理学家的朱熹，把“理”说成是形而上的宇宙本体，是先于物质的第一性的东西。朱熹站在复古倒退的贵族大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的封建统治，甚至把“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直接同他所讲的“理”联系起来，说什么“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⑥意思是说：“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是先验的、永恒的“天理”，是绝对精神的体现，是任何人必须无条件遵守而不得背离的最高原则。

为了推行这一套教条，朱熹特意编辑了一本名曰《小学》的教科书，专讲“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强调“后生初学，专看小学之书，那是做人底样子。”⑦在此基础上，他还为“发明此事之理”⑧的《大学》编注释，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三纲五常”作了阐发。在主讲白鹿洞书院的时候，他又把“三纲五常”具体化为学生守则，要大家“相与讲明遵守”⑨。他喋喋不休地阐述的这一套封建的待人处世教条，有以下五个重点：第一、强调“君臣父子，定位不易”⑩。要人们永远服从封建等级统治。第二、宣传人的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就是求“仁”，说什么“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⑪认为“仁”是包举“义礼智信”的总纲。孔子说“仁”就是“爱人”，朱熹进一步解释说：“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⑫。其实这些纯属欺骗。在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爱人”是根本不可能的。儒家所谓的“仁”，不过是维护剥削制度，镇压人民反抗的武器罢了。第三、鼓吹“行笃敬”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⑭。照理学家们的解释：“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⑮。“主一无适”就是要拿定主意，不稍松懈；就是要经常严肃地考虑自己的言语行动，坚决维护“三纲五常”。朱熹还得意忘形地断言：“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⑯可见，在他看来，这个东西实在是剥削阶级统治老百姓的一个重要法宝。第四、提倡“惩忿窒欲”⑰，要求人们从灵魂深处消灭掉要造反、要革命、要斗争的“忿”与“欲”，安分守己地当奴隶。朱熹活象一个骗人钱财的巫婆，花言巧语，以售其奸。他鼓吹什么“明天理、灭人欲”，胡说什么“宝珠沉溺水中，明不可见，去了溺水，其宝珠依旧自明。”⑱其实，如果依了他的“灭人欲”的方法做去，不仅不能成为脱去溺水的

宝珠，反而只好变作入于溷水的蛆虫。所谓“惩忿窒欲”，不过是实践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的行动纲领的具体措施罢了。第五、宣扬“忍耐”。他说“穷须是忍，忍到熟处，自无戚戚之念矣。”^{①7}对于被剥削阶级来说，哄骗他们忍耐贫穷，吹嘘由此可以成为“坦荡荡”的“君子”，而不再是“常戚戚”的“小人”，这是欺人之谈。真正的目的，是要老百姓甘心情愿地忍受剥削与压迫。但对于那些玩弄权术的人来说，“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则正是他们反对革命的“韬晦”之计。

朱熹这一套待人之道得到了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衷心赞赏不是偶然的。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竟然指使他的死党和一些人，从朱熹的《四书集注》里东抄西摘，搞了个《四书集句》。他十分重视“三纲”中的君臣之义，鼓吹“君使臣以礼”，一方面作出种种“求贤”的姿态，拼凑大小反革命“舰队”，拉拢别人上贼船；另一方面则要求他的死党“臣事君以忠”，要他们“永远忠于”林家父子。对于“五常”，林彪也疯狂加以鼓吹，胡说什么“要用其内容”。他甚至把“仁”说成是“团结”，宣传“以仁爱之心待人”，并以“不成功便成仁”去要求他的死党。林彪也非常重视“敬字工夫”。他把“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作为教子经，写给林立果，梦想建立林家法西斯世袭王朝。我们知道，蒋介石被赶出大陆逃到台湾以后，也对“敬字工夫”很感兴趣，一再叫嚷要“庄敬自强”。真是难兄难弟，无独有偶了。此外，林彪所欣赏的“忍耐”以及他到处贩卖兜售的“中庸之道”等等，可以说无一不是从朱熹那里承袭而来的。

朱熹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最反动的思想家和代言人，他提出的一整套待人处世的道德规范是为巩固封建地主的统治效劳的。恩格斯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反杜林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还在封建社会，朱熹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就受到了历代农民起义的许多领导人物的痛斥与反对，他们对君不“忠”了，他们对地主阶级不“仁”了，他们不“惩忿窒欲”了，他们也不信什么“中庸之道”了，一句话，他们不能忍耐朱熹的待人处世的道德教条的束缚了，他们要造反、要革命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位领袖说得好：“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①8}理学家主张的一套“三纲五常”的理论，同样也受到了在封建社会里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驳斥。清朝戴震就曾尖锐地指出，“三纲五常”是“以理杀人”，并以无比感慨的心情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①9}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对于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极其深刻的剖析，他说：“三纲五常”实际上是杀人的“软刀子”；“仁义道德”不过是“吃人”的同义语。后来在《祝福》中，鲁迅还刻划了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的形象，这个朱熹的信徒正是“以理杀人”的刽子手。总而言之，朱熹宣扬的一套待人的道德教条是我们无产阶级坚决反对的。林彪妄图把封建社会的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超阶级的待人处世的原则强加给我们，不管他说得怎样口若悬河、天花乱坠，我们都将予以迎头痛击，给予彻底批判！

（三）

朱熹虽然不遗余力地宣传了一整套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道德教条。但他自己却没有全部遵守，甚至全部没有遵守。正象柳下跖痛骂孔丘为“巧伪人”一样，朱熹也被人斥之为“伪君子”和“假道学”。列宁同志说得好：“每一个有生活经验的人，望见

‘善良君子’极‘光滑的’面貌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地断定他‘大概是个骗子’。”

(《伟大的创举》)

和朱熹同时的一些人，曾经揭露朱熹“言行相违”的两面派丑闻，这就证明除了他经常口头叨念的“三纲五常”之外，骨子里还另有一套野心家、阴谋家奉行的处世哲学，对于这一套处世哲学，林彪也十分欣赏，并身体力行。

朱熹在实际生活中奉行的反动处世哲学可以概括为下面四个方面：

一曰大搞阴谋，如鬼如魅。

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是不会“潜形匿迹，如鬼如魅”的。但朱熹却专搞秘密活动。他同他的党徒，“每夜三鼓，聚于一堂……至晓则散，谬议时政之得失。”^{②0}无异乎一个裴多菲俱乐部。朱熹在湖南作地方官的时候，一次他得到了情报，知道新皇帝马上要登极并大赦天下，立即从监狱中取了十八名囚犯，都是“三纲五常”叛逆者，全部处以死刑。待到赦令下达，刽子手朱熹已经把事情干净利落地结束了^{②1}。这次皇帝的更迭，乃是朱熹的同党赵汝愚搞的一次宫廷政变。他们“夜以兵分卫南北内”，“密制黄袍”，行动是十分诡秘的^{②2}，朱熹虽身在湖南亦预其谋。此外，朱熹还“里通外国”。他得到皇帝提拔，被任命为湖南的地方官，就是因为“使者自金还，言金人问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②3}超级间谍林彪策划反革命政变，大搞特务活动，既取法于法西斯，也有抄袭朱熹一套的。

二曰结党营私，排斥异己。

朱熹是个堆山头，搞宗派的能手。他带领门徒四出活动，“妄希孔孟历聘之风。”他在担任救灾工作中，甚至把救济的钱粮，尽发给门徒和同一宗派的人，而不发给一般老百姓^{②4}。在政治上，他属于以宰相赵汝愚为首的反动官僚集团。赵汝愚去世，朱熹率其门徒百余人，放声大哭，如丧考妣。所以明代李贽在评论赵汝愚的时候曾说：纵使朱熹自己声明，“我不为党，不为伪”，别人也是不会相信的；别人还是要认为朱熹是阿附丞相的^{②5}。有一次朱熹受到皇帝的召见，他绝口不谈抗金雪耻的国家大事，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攻击一个对当时政治局势毫无关系的宦官上。这种以我划线、排斥异己的作风，实在是极端恶劣的。对此，李贽十分感慨，指出：朱熹“快一己之喜恶，流无穷之毒害。”^{②6}他在彻底地考察了道学家的全部行径之后，下了一句总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②7}这是十分中肯的。而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方面，可以说虽然效法朱熹，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较诸朱熹一套，更有甚焉！

三曰以屈求伸，装腔作势。

《宋史·道学传》记载朱熹每次受到皇帝征召或任命，总要力辞，又辞，再辞，前后共达二十八次之多。朱熹的《文集》里，关于“辞免”类（卷二十二、二十三）就刊载了一百多篇奏折文书。有人指出，朱熹的“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其伪不可掩”。一次在朱熹请辞之后，皇帝果然赏了他一个级别高一些的官职，朱熹只得厚起脸皮说“求退得进，于义未安”，终于扭捏地拜受了新命。这同林彪的表演何其相似乃尔！林彪也曾搞过“恳辞再三”的把戏，甚至还装腔作势地说：“我很不安”，“我组织上服从，我保留个人意见”，“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待到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林彪图穷匕现，狂叫要设国家主席，发动政变，抢班夺权。可见林彪这一套确实是从朱熹那里学来的。此外，朱熹也讲韬晦之计。他本字元晦，后来发觉“元”为四德（元亨利贞合称“四德”）之首，未免锋芒毕露了，于是改字仲晦^{②8}。“仲”是老二的意思，孔丘不也字仲尼吗？朱熹的韬晦实在是十分细致的啊，真不愧是林彪称奉的一位祖师爷！

四曰欺世盗名、言行不一。

朱熹这个道貌岸然的“君子”，实际上私生活是极其糟糕的。他曾经引诱两个尼姑为自己的小老婆。他一面打起“安贫守道”的旗帜，另一方面却实行“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脩之厚”。他标榜廉洁，可是公开接受人家的赠礼。“四方贿赂，鼎至踵来，一岁之间，动以万计。”他提倡孝道，可是却拿不堪食用的劣质米供养母亲，而在他的家乡本来是盛产上熟白米闻名于福建的。他鼓吹仁爱，可是却狠狠地“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鲁迅：《论俗人应避雅人》），企图苦打成招，取得口供，用以诬陷一个不属于他的宗派集团的人，大搞政治迫害。他甚至明目张胆地发掘别人的祖坟，暴露尸骨，侵占坟地，用以埋葬自己的母亲；为了扩充地主庄园，竟利用权势，霸占了别人的山林。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自称永远忠于孔孟之道，公开高唱“天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美妙颂歌的朱熹，听说建阳县供有孔子“圣象”的县学，“风水”很好，是个出侯王的地方，竟企图夺取孔子的宝座，据县学为己有，使人用大木头和粗绳子把“圣象”捆缚起来，强令搬家，结果弄坏了孔老二的手足，闹得满城风雨，舆论哗然！^{②9}

如上所说，朱熹的所作所为和他的所讲所述是如此的自相矛盾，这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呢？还是林彪一语领悟了其真谛：“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就是朱熹待人哲学的精髓所在。林彪奉行朱熹的反动处世哲学，终于成为一个假话说尽，坏事做绝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但他没有能办成“大事”，反倒垮台了，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鲁迅先生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捣鬼心传》）这是很正确的结论。

（四）

林彪在黑笔记上，写了“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是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四年。这段时间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在国际上，苏修趁着我们遭到特大的自然灾害，对我们施加压力，猖狂反共反华。在国内，虽然我们于一九五九年取得了庐山会议粉碎彭德怀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在蠢动。他们配合国际上帝、修、反的反革命逆流，兴风作浪，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大反三面红旗，大肆推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翻案复辟。面对这种情况，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就是当时斗争形势的具体写照。林彪在这场斗争中是顽固地站在帝、修、反一边的。他为了搞复辟、搞阴谋，就不得不借助于孔孟之道，借助于朱熹的处世哲学。

林彪叫嚷“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无非是妄图用“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道德标准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三面红旗；无非是妄图用虚伪的仁爱说教，来否定阶级斗争，否定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其目的就是要替苏修翻案，替王明、彭德怀翻案，替所有的地、富、反、坏、右翻案，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

朱熹的待人之道除了有他口头上鼓吹的“三纲五常”一面之外，还有他行动上欺世盗名，玩弄权谋的另一面。一九六二年一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特别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要吃亏的。”心怀鬼胎的林彪听到这话，自然感到“说破英雄惊煞人”了。于是朱熹的两面派手法便成为他“掩饰”阴谋，窥测方向，伺机进攻，以求一逞的重要武器。由此可见，林彪在这一段时间强调要向朱熹学习并不是偶然的。

必须指出：朱熹在南宋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是顽固站在封建贵族大地主阶级立场上，坚持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坚持儒家思想反对法家思想，坚持妥协投降反对抗战救国的。他的一整套待人处世的哲学，是为其奉行的反动路线服务的。林彪之所以特别欣赏朱熹的待人之道，也正是由于林彪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尊儒反法，投降苏修，投降美帝；在实质上，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同朱熹奉行的反动路线完全一致的，因此需要一整套为反动路线服务的相同的待人处世哲学，这就是林彪为什么要向朱熹学习待人之道的答案！

注：

- ①朱熹：《文集·戊申封事》。
- ②陈亮：《龙川文集·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 ③④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道学崇黜”。
- ⑤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
- ⑥朱熹：《文集·读大纪》。
- ⑦⑧朱熹：《语类》卷七。
- ⑨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十九“晦翁学案”下。
- ⑩朱熹：《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
- ⑪朱熹：《遗书·近思录》卷一。
- ⑫朱熹：《文集·玉山讲义》。
- ⑬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十九“晦翁学案”下。
- ⑭朱熹：《语类》卷十二。
- ⑮⑯《二程遗书》卷十五。
- ⑰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十九“晦翁学案”下。
- ⑱朱熹：《语类》卷七。
- ⑲张伯行：《续近思录》十二。
- ⑳陶宗仪：《辍耕录》。
- ㉑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
- ㉒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五十五。
- ㉓见《宋人逸事汇编》下册。
- ㉔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一“两朝内禅”。
- ㉕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五十三。
- ㉖见《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
- ㉗⑳李贽：《藏书》卷三十五“赵汝愚”。
- ㉘李贽：《初谭集》卷四。
- ㉙见《宋人逸事汇编》下册。
- ㉚见《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